

志说吕梁黄河：从古方志记载到新时代传承

□ 郝治文

黄河，这条奔腾不息的母亲河，自北向南流经吕梁市兴县、临县、柳林、石楼4县19个乡镇，流程296公里，约占山西黄河总长的三分之一。千百年来，吕梁人民与黄河共生共荣，在融合、抗争、治理的漫长岁月中，孕育了独特的黄河文化。吕梁历代地方志作为记录地方自然、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文献，保存了大量关于黄河的珍贵记载，是研究黄河文化、探寻“黄河之治”历史智慧的重要史料宝库。系统梳理这些记载，对于延续历史文脉，坚定文化自信，推动新时代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。

一、历代方志中的黄河治理

（一）黄河地理与水文景观

历代方志以严谨的笔触，构建起一套关于黄河地理与水文景观的完整认知体系，其记载由粗疏渐趋精密，不仅还原了自然本貌，更融入了从敬畏神威到感念灵泽的情感变迁。

1. 河道区位的认知演进。对于黄河在吕梁境内的流向，不同时期的方志记载呈现出清晰的学术演进过程。早期记载较为概略，如《山西通志》引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“吕梁在离石北以东可三百余里”，地理记述尚属笼统。至清代考据学兴盛，河道考证趋于精准。乾隆《汾州府志》由戴震纂修，其水道考证极具学术价值，志载：“临县黄河，上接兴县界红石滩碛……行百八十余里。永宁州黄河……行六十余里。宁乡县黄河……行四十余里。”戴震精准考证了汾州府各县黄河境况，修正了地理记载的偏差，彰显了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。光绪《永宁州志》也清晰勾勒出黄河在吕梁境内的基本流向：“黄河自朔平府平鲁县西北折而南流，……复西南经临县南流入州界……又南经孟门故城。又南左得离石水，入宁乡县。”

2. 晋陕峡谷的水文河景。吕梁段黄河地处晋陕峡谷，高山夹岸，激流险滩遍布，方志中完整留存了多种水文景观史料。关于峡谷激流，乾隆版《兴县志》有生动记述：“河流自北而南，两岸皆崇山列峰……水冲巨石，横列中河，嵯峨历乱，激浪腾波，湍洄澎湃，声震数十里，近者人不闻语音……”以动态文字刻画黄河桀骜水势，客观印证了峡谷“东水攻沙”之自然机理。

历代方志对季节性灾害水文亦有记载。光绪《永宁州志》载：“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六日，磻口黄河水涨十余丈，沿河淹死人畜，冲塌民房无数”，直观展现了夏秋汛期黄河水患的毁灭性破坏力。乾隆《兴县志》则记录了冬季流凌景象：“至立冬后，河冰流渐，大或数丈，蔽河而下，舟筏不行，俗谓之流凌，三春亦然。”大块浮冰阻断航运，冲击堤防，为古今黄河气候、河道灾害研究留存了一手史料。

方志中还记载了特殊祥瑞水文“黄河清”。乾隆《汾州府志》载：“雍正四年十二月丙寅，临县、永宁州、宁乡等州县黄河征清……凡山西布政司境，上下二千余里，河清如鉴，一月有奇。”民国《临县志》亦有佐证。古人秉持“天人感应”观念，视其为盛世祥瑞。现代科学可解释为上游来沙减少、泥沙沉降所致，此记载堪称黄河水文异变的珍贵历史记录。

3. 沁园春·雪的色彩记忆。据《石楼县志》记载，1936年2月，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，转战石楼，在石楼县留村等地驻足指挥东征，面对晋陕峡谷间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的壮阔景象，写下了气吞山河的千古绝唱《沁园春·雪》。词中“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”的雄浑词句，不仅是对黄河冬日封冻、激流暂歇这一真实水文景观的生动写照，更勾勒出秦晋高原“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”的磅礴气势。这种对黄河地理风貌的诗意升华，将自然天险化作了革命者“欲与天公试比高”的豪情壮志，让方志中冰冷的地理水文记录，从此拥有了滚烫的历史温度与文学灵魂。

（二）黄河岸边的社会生活

黄河既是分隔秦晋的天堑，亦是跨区域流通的黄金水道。吕梁历代方志借渡口、防务、商贸等记载，还原了黄河沿岸地方社会生活脉络。

1. 磻口古镇的水运兴衰。民国版《临县志》载：“磻口之名已古，而磻口镇之名则自清嘉靖年间始。明清至民国年间，凭借黄

河水运一跃成为北方商贸重镇，享有‘九曲黄河第一镇’之美誉。”由于黄河行至磻口大同碛，河道收窄、落差陡增形成险滩，下行船舶无法通行，货物必须水陆中转，由此催生大型转运码头。志书补充建镇源流：“磻口古无镇市之名，自清乾隆年间河水泛滥冲没县川南区之侯合镇，并黄河东岸之曲峪镇，两镇商民渐移居积于磻口。至道光初，元商务发达，遂称水陆小埠。”书记载，清道光至民国初年，磻口拥有商号三百六十余家，形成“西接陕、甘、宁、蒙，东连太原、京、津”的跨区域商贸廊道，孕育了黄河晋商特色文化。

2. 沿古渡中的商贸往来。黄河自古为秦晋天然分界，吕梁沿黄各县密布渡口，是两岸物资交换、人口流动、文化交融的通道。乾隆《汾州府志》记载，临县、永宁州、宁乡县、石楼县有黄河津渡16处。其中兴县黑峪口、临县曲峪、三交等渡口兼具商贸与戍守双重功能。乾隆版《兴县志》完整划定了兴县黄河全域河道，并点明津渡战略价值：“若欲麟府之喉，固云朔之腹，则合河、黑峪、滩头三渡，尤为要津。守土者不可不加之意也。”《柳林县志》记载，三交村明清即为黄河渡口与陆路码头，是两省四县商品集散中心。陕北信天游、山西梆子等民间文艺借渡口跨河传播，实现了秦晋民俗的双向交融。

3. 黄河沿岸的社会治理。黄河渡口兼具商贸与军事双重功能，遇匪患、瘟疫时官府出台严格管控举措。民国《临县志》记录了多起流贼借黄河渡口入侵山西的史实：明崇祯二年，府谷人王家胤率贼众渡河围攻临县城。崇祯五年春，流贼张有义、贺宗汉渡黄河占据汾州。十一月，贼首王之臣攻破临县全境。乾隆《汾州府志》载：“崇祯十七年正月，李自成度黄河而东，陷汾州府。”印证了黄河渡口一旦失守，则山西腹地便门户洞开的历史镜鉴。

疫情防控也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。《合河政纪》记录，民国七年一月口外肺瘟蔓延，兴县列为防疫一线，实施全域管控。设立黑峪口、界河口、县城三处检查所，九处沿河巡查卡，隔离所、留养所各三处。抽调驻军配合查验，配置宣讲员、医士全域宣传防疫知识。全面检查往来邮件，停止黄河渡口通航，切断了疫病跨河传播渠道。

（三）黄河神话与天地意象

方志作为一方全史，既录山川地理，亦承载本土精神记忆。吕梁历代方志的黄河叙事以大禹治水神话为核心，融合了诸多神话传说和人民的精神寄托，是黄河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。

1. 吕梁山下，大禹治水的传说源远流长。相传离石古有刘耽《吕梁碑》留存有相关记载，是大禹治水行经吕梁这一上古传说的早期文献线索。乾隆《汾州府志》载：“山有汉刘耽碑，可辨者六十字，言舜禹治水時事，山顶有小庙，刻记至元年号。”碑文记载与《吕氏春秋》“龙门未开，吕梁未发，河出孟门之上”的记载相互参证。方志编纂者结合地理方位阐释传说脉络：“离石去天桥仅二百余里……吕梁在河之上流，龙

门在河之下流，泄龙门而更泄吕梁，上下始无阻遏之处。故吕不韦谓龙门未启，吕梁未凿，河出孟门之上，非未见也。”

2. 骨脊山下的“铁环系舟”。吕梁山别名骨脊山，蕴含着古人关于天地秩序的文化隐喻，多部方志互证：万历《汾州府志》载：“吕梁山一名骨脊山……禹治水经于此。”《永宁州志》考证：骨脊山“穹窿居中，为天地之骨脊”。雍正《山西通志》记：“吕梁山，在州东北百里……一名骨脊山，东河源此。”古人视名山大川为天地骨架，“骨脊”二字，赋予吕梁山脉支撑天地秩序的文化意象。光绪《山西通志》收录当地风物传闻：“吕梁山，俗呼骨脊山。旧传山半有蛤鼈及系舟遗迹。少东曰铁鑊山，旧传有铁环……”山石留存“系舟”遗迹的民间传说，将大禹治水的文化故事固化为地方风物标识。

3. 孟门关外的“神威灵泽”。《永宁州志》载“永宁州九景”，其中三处与黄河密切相关，尤以“孟门洪涛”与“黄河晚渡”的对照最为震撼，共同勾勒出先民对黄河既敬畏又感念的双重情感。

孟门洪涛，尽显黄河之“神威”。《汾州府志》载：“隋孟门关，地甚险固，洪涛水泛滥也……龙门未辟，河出孟门东，大溢，禹凿龙门，水南流。”在远古神话故事中，孟门峡谷那排山倒海的汹涌水势，被先民视作水神逞威的体现。明代梁天叙在《题孟门洪涛》中写道：“太行西降河，绝险孟门阿。险绝与水神传说融为一体，字里行间透出古人对大河伟力的敬畏之心。

黄河晚渡，则彰显黄河之灵泽。明万历《汾州府志》载：“黄龙津在官果园，水波极平，夜渡无虞。”当狂暴的洪涛退去，平缓的河面与安稳的夜渡，宛如神灵收敛了怒火，化作滋养两岸的仁善恩泽。“黄龙津”的命名本身便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，这风平浪静、夜渡无虞的奇迹，被先民视为神灵的庇佑与恩赐。

4. 黑龙庙里的“隔岸听戏”。商贸航运风险极高，沿岸民众渐渐形成祭祀河神的民俗传统，磻口黑龙庙正是这一信仰的核心载体。《临县志》载：黑龙庙始建于明代，清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年）增修钟鼓楼，“集声学与建筑技艺为一体，演员登台唱戏，声音清脆，远闻数里”。庙内供奉龙王、河伯、风伯，分掌水、河、风三事，均为黄河行船关键自然要素。船工出航前祭拜祈求风平浪静，归航后还愿酬神。此类民间民俗是先民应对黄河自然风险的精神寄托，是黄河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。

二、黄河文化保护弘扬的实践探索

近年来，吕梁市立足历史文脉，对接黄河国家战略，从生态法治、文旅融合、数字赋能等方面持续探索，推动古老黄河文化焕发新生，打造出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吕梁样本。

一是从文物管护走向生态立法。地方志留存黄河历史记忆，法治建设护航黄河长远发展。吕梁依托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实施，健全市、县、乡三级文物保护责任体系，借助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，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500余处。创

新推行文物认领认养模式，认养文物149处，社会投入超6600万元，规模居山西首位，是民间公益传统的现代制度化实践。地方层面出台《吕梁市水土保持条例》，落实《黄河保护法》要求，统筹水土流失治理与流域高质量发展。2025年，全市36项“一泓清水入黄河”工程全部投用，当年国考、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100%，实现由期盼“黄河清”到清水入黄的现实转变。

二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文化串联。方志所载关隘、渡口，依托这条交通动脉转化为文旅载体。黄河一号公路2018年开工，2024年全线贯通，总长876公里，串联72处景点，配套慢行道、驿站、房车营地、观景台等设施，兴县段获评全国“最具人气的路”。黄河一号公路带动沿线160万亩红枣产业与30余个特色农业园提质，让“黄河晚渡”“孟门洪涛”等古籍景观成为游客可体验的实景。

三是磻口古镇的文旅融合范式。作为方志记载详尽的黄河古渡，《吕梁市磻口古镇保护条例》为古镇保护提供法治保障。当地依照方志史料修缮古建筑，设立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，现已建成国家4A级景区，民宿、农家乐等业态兴旺，直接带动5000余人就业，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。实景演艺《如梦磻口》活化当地传统民俗。以磻口古镇为沿黄文旅融合核心支点与示范标杆，柳林黄河沙滩码头、石楼黄河奇湾景区、临县开阳黄河艺术村等沿线特色项目统筹推进，多点发力，不断丰富黄河文旅体验新场景。

四是非遗文化的薪火传承。方志记录黄河风物，非遗承载黄河文化。2025年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（吕梁市）获批，临县伞头秧歌创新剧目《舞动黄河》、黄河母亲制作技艺等非遗项目持续活化，吕梁学院开展非遗传习活动，延续流域农耕文明。

五是黄河故事的学术传播。吕梁学院设立黄河文化研究中心，围绕吕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主题举办“吕梁论坛”，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。2025年3月在磻口举办首届黄河流域青年生态文明交流活动，并发布《磻口宣言》，将为守护母亲河永续发展注入持久动能。此外，吕梁还在北京、西安、兰州、上海等地举办文旅推介会，让吕梁的黄河故事走出了大山，走向了全国，乃至世界。

吕梁历代方志文献将黄河文化的历史记忆系统化地保存下来，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。这些方志文献既是研究黄河文化的重要史料来源，也是传承弘扬黄河文化、讲好黄河故事的文化瑰宝。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今天，我们在诸多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，无不彰显着方志文献中黄河文化记载的当代生命力。深入挖掘、系统研究、活态传承这些方志文献中的黄河文化，对于坚定文化自信、赓续中华文脉、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，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。

（作者单位：市委党史研究室）



杜小燕 摄

深耕红色热土 追寻先辈足迹

——以《话说吕梁》创作实践谈红色纪录片用人物叙事阐释吕梁精神

□ 冯伟

吕梁是红军东征的主战场，是革命圣地延安的东部屏障，是晋绥边区首府和中央后委机关所在地。红军早期领导人贺昌、少年英雄刘胡兰等无数吕梁儿女，用鲜血和生命锻造了对党忠诚、无私奉献、敢于斗争的吕梁精神。这一精神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，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、一件件滚烫的事、一次次艰难抉择汇聚而成的精神长河。

红色题材创作，根基在于“求真”，灵魂在于“共情”。吕梁市融媒体中心红色纪录片《话说吕梁》——百年人物系列历时两年、四万余公里寻访，走遍全国二十余个省份，沿着革命先辈战斗、生活的轨迹，先后完成四季共20集作品。前三季以纪实寻访、口述史料、旧址实拍为主，推出《追寻贺昌的足迹》《毁灭纾难牛友兰》《红色士绅刘少白》《游击队长刘塘如》《忠诚战士牛荫冠》《传奇雅士冀贡泉》《红色特工冀朝鼎》《巾帼豪杰刘亚雄》等代表性篇目；第四季《铁血男儿刘侵霄》《侦察英雄边子正》在前三季纪实创作的基础上创新表达，适度运用情景再现、时空对话的影像手法，补齐叙事留白，强化情感代入，实现纪实底色与艺术表达的平衡。

在项目启动之初，团队就确立了贯穿四季的核心理念：不做通史式史料堆砌，坚持以人物为锚、以足迹为线，以精神为魂，走出去寻访、沉下来倾听，把吕梁精神放置在人物具体的人生抉择、苦难坚守、无私奉献之中去解读。

很多吕梁红色人物的生命轨迹并不局限于吕梁本地。贺昌离开吕梁投身全国工人运动，作为红军高级将领，牺牲于江西会昌；牛荫冠走出兴县，辗转多地从事地下工作、政权建设与新中国工业建设；刘侵霄、边子正等跟随部队转战南北，为新中国的成立浴血奋战。面对如此丰富的史实，如果只局限在吕梁本地拍摄，故事就是残缺的，人物形象是割裂的，无法完整看懂他们的选择，也就无法读懂吕梁精神向外延伸的力量。

寻访路上，我们的工作分为三条主线并行：第一，史料考证线。对接各地档案馆、党史研究部门、革命纪念馆，查阅原始档案、书信、电报、回忆录、老照片，交叉比对记载，厘清时间线、关键事件，规避史实错误，守住红色纪录片真实性这条生命线。第二，口述抢救线。寻找先辈亲属、老战友后代、地方文史研究者，记录口述回忆。很多亲历者年事已高，这些口述是不可再生的活史料，是文献之外最有温度的补充。《毁灭纾难牛友兰》《忠诚战士牛荫冠》两集中大量家庭细节、家族抉择的内容，就来自牛氏后人的口述；《侦察英雄边子正》中很多敌后侦察的细节，是依靠边老自己的回忆、留存的老记、战斗生活地群众的回忆互相印证整理而成。第三，旧址踏勘线。抵达先辈曾经求学、工作、战斗、牺牲的现场，在原地拍摄环境空镜，感受地理环境带给人物的影响。拍摄《追寻贺昌的足迹》时，我们从柳林出发，到太原、上海、江西等地，连闯大山、南方丛林，突围战场的现场画面，让观众读懂他“颈血常思敌国溅，寸心久欲报家邦”的家国情怀。

整个系列片始终坚持一个底层逻辑：吕梁精神不是只留在吕梁大山里的精神，吕梁儿女把“对党忠诚、无私奉献、敢于斗争”的品格带到了全国各个战场、各个岗位；而我们跨区域追寻足迹，就是用镜头证明：这片热土孕育的品格，伴随他们的脚步走向远方，在不同的战场上闪光。

前三季的创作目标，优先是史料抢救与史实留存。所以拍摄手法上，坚持“纪实优先”：镜头抵达现场，采访、读档、踏勘，旁白平实克制，不做戏剧化演绎，把话语权交给史料、后代、文史专家。这种方式优势是严谨、厚重，适合留存史料，但是也存在局限：久远年代缺少影像，很多心理活动、抉择时刻只能依靠文字转述，观众的代入感有限，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容易打开。这也是团队启动第四季创作时想要突破的方向。

经过前三季15集的实践，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寻访经验，同时也反思纪实范式的局限：单纯依靠口述、照片、旧址，但很难让观众走进人物的内心，理解人物在重大抉择前的挣扎、牵挂、不舍与坚定。为此，第四季在严守史实底线、绝不虚构核心情节的前提下，调整创作策略，引入适度情景再现，构建“时空对话”的叙事结构，和前三季形成明显区别。

“时空对话”，就是搭建两条叙事线索并行：一条是当下之线，也就是我们创作团队、后人、研究者，行走在先辈的旧址之上，回望历史、提出追问；另一条是历史之线，通过克制的情景再现，还原人物身处历史现场的瞬间。两条线索交叉蒙太奇，形成今人与先辈跨越时间的对视。

和前三季相比，第四季的变化集中在三点：第一，叙事重心从“记录事件”转向“体察人心”。前三季重在厘清人物做了什么、经历了哪些战斗与工作；第四季更关注人物为什么这样选择，他的顾虑、牵挂、信念是什么，让英雄从“事迹清单”变成有亲情、有软肋、有信仰的活生生的人。第二，影像语言从“记录式”增加“共情式”表达。保留寻访实拍、口述采访这些基础元素，在关键节点、情感节点插入短的情景再现片段，补足画面，营造氛围感，提升观众代入感。第三，传播视角兼顾大屏和青年受众，节奏更有起伏，时空对话的形式更容易打动年轻观众，适配短视频二次剪辑传播。

四季20集是一个完整的整体，共同服务于“用人物故事讲好吕梁精神”这一总目标。吕梁精神从来不是抽象的标语，它藏在贺昌慷慨赴死的信念里，藏在牛友兰倾家支援边区的抉择里，藏在牛荫冠一生服从大局的坚守里，藏在刘侵霄、边子正不惧生死的冲锋里。整个系列构建起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：从吕梁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信仰、大义、坚韧、担当，随着一代代吕梁儿女走向全国各地，在不同时代持续发光。

两年四万余公里、跨多省寻访的创作经历，也让我们直面市级融媒体中心红色纪录片创作普遍存在的难题，这些反思对同类地方红色题材创作具有参考意义：第一，史料的碎片化与抢救紧迫性。很多本土红色人物记载分散在全国多地档案馆，很多知情老人年事已高，口述史料随时可能消失。这也是我们坚持跨省长距离寻访的动因。地方媒体应当和党史部门、纪念馆建立长期协作，形成常态化口述史料抢救机制，而不是临时项目式挖掘。第二，资源有限，要坚持扬长避短。作为市级媒体，经费、周期、人员、设备都无法对标国家级大型红色纪录片，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宏大场面、特效制作，而在于本土熟悉度、在地情感，持续深耕本土人物。所以本项目选择小切口人物系列，持续推进，打造本土红色影像IP，而不是追求一次性宏大大片。第三，创新表达必须守住底线。第四季情景再现、时空对话的尝试证明红色纪录片可以创新语态，但创新有红线：史实不能虚构、英雄不能娱乐化。情景再现的尺度拿捏，是基层红色题材创作最需要把握的平衡点。过度保守容易沉闷脱离受众，过度戏剧化会消解纪录片的公信力。

巍巍吕梁山，是红色热土，也是精神原乡。对于《话说吕梁》创作团队而言，这次追寻先辈的足迹本身就是一次接受吕梁精神洗礼的过程。作为地方媒体编导，我们的使命，就是持续扎根这片红色热土，持续沿着先辈足迹寻访，以影像为载体，坚持真实为本、守正创新，讲好一个个属于吕梁的红色人物故事，让艰苦奋斗、顾全大局、自强不息、勇于创新的吕梁精神跨越时空，持续传递给新时代的观众，为老区文化传承、精神弘扬贡献主流媒体的影像力量。

（作者单位：吕梁市融媒体中心）

走好公共文化供给的创新之路

□ 梁瑜

在黄河文化与红色文化交织的吕梁，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早已超越了单纯举办活动的范畴，正日益成为滋养人心、提振精神、激活乡村的关键力量。近年来，我市以法规为基石，构建起从市到村的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，使图书馆、文化馆、博物馆、乡镇文化站及村级服务中心化身为群众触手可及的“文化客厅”，让书香真正飘散在街头巷尾。年均上万户的惠民活动，将精神食粮送达超百万人次，这不仅是对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坚实保障，更是区域

文明进步的生动注脚。

在实现“全覆盖”的成就之余，如何使公共文化供给更为精准、更贴心民，成为我市面临的新课题。目前，部分文化产品与群众，特别是老年人、青少年等特定群体的真实需求之间仍存在距离，农村地区渴望更多沉浸式文化体验。同时，产品同质化现象时有显现，顶尖的精品力作和融合科技的创新产品尚显不足。优质文化资源在城乡间的分布仍不均衡，习惯性地向城市集聚。此外，基层文化人才的数量与专业

素养，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的深度与广度，都呼唤着更为系统、有力的支撑。

迈向更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，关键在于推动从“单向输送”到“双向互动”的深刻转变。亟需建立一套能够倾听群众心声、并据此动态差异化产品与服务的闭环机制，让城市书房、流动文化服务与非遗体验真正融入城乡的“15分钟生活圈”。深化融合创新是必由之路，应加快公共文化云平台建设，运用VR展览等数字化手段拓宽服务边界；整合独特的黄河文化与红色文化资源，将面